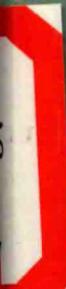


John Berger
Bento's Sketchbook



约翰·伯格作品

本托的素描簿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

Beverly reading

正在阅读的贝弗莉

今年秋天，上浆李子（quetsch plum）大获丰收。有些果树的枝干甚至不堪重负，应声折断。我不记得哪个年头曾经结过这么多的李子。

紫色的李子，成熟之后就会蒙上一层霜衣，这是尘土的色彩。正午时分，若有阳光——正好一连几天都是晴天——你会看到成串的李子挂在树叶后面，现出尘土的颜色。

其他水果只有蓝莓是蓝色的，但是蓝莓的颜色较深，就像宝石，上浆李子的蓝色却像一股活泼艳丽然而正在消逝的烟雾。这些果子每簇四枚、五枚或六枚，一把一把似从树枝的嫩芽伸长出来。一棵树上，就有数百把之多。

一天清晨，我决定画下其中一串。也许是为深入理解，为何我总说“一把一把”的李子。那幅素描又丑又糟。我开始重画。在我画的那串李子旁边，还有三串李子，一只黑白相间、只有我的指甲大小的蜗牛，正在它刚吃过的叶子上睡觉。这张素描同样糟糕。于是我放下了画笔，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
傍晚时分，我又回到那棵李子树下，心里想着再画一次那串李子。可是，也许因为光线变化的缘故——太阳已经不在东方，而在西方——我找不到或认不出早上那串李

子了。我甚至问自己，有没有来对地方。

我走到旁边那棵，钻进树枝底下，屈着身子，朝上查看。上浆李子数不胜数，可是没有我那一把。照说，另外再找一串也很容易，可我心里就是过不来劲。我在两棵树的枝子底下转来转去，一遍一遍地找。后来，我发现了那只蜗牛。在它左边三十厘米的地方，我找到了我的那串李子。蜗牛已经换了地方，不过还在周围活动。我把它好好端详了一番。

我开始画。但我缺少绿色颜料，没法画出树叶。我的脚下有些荨麻。我摘下一片叶子，按在纸上研磨，这样我就有了绿色。我把这次的画留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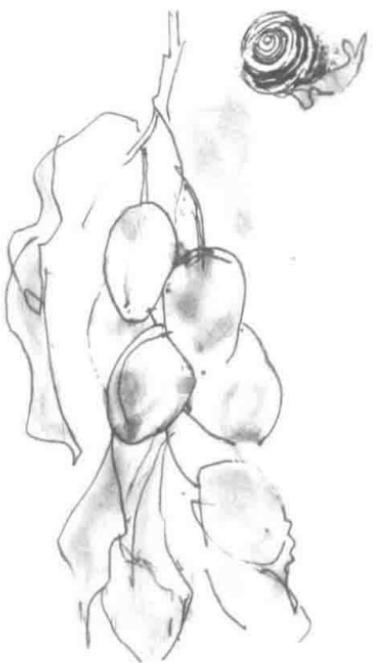
三天之后就是收获李子的日子。如果装进木桶发酵数月，可以得到蒸馏提纯的顶级李子白兰地酒。也可制成上等果酱和美味馅饼。

采摘上浆李子有两种方法，一是摇动树干，这样许多李子就会掉到地上，二是提着桶子爬到树上，用手去摘。

这些李树长着初生的小刺和茂密的细枝。虽然高高在上，你却觉得像在灌木丛中爬行，穿过一个小小的蓝色烟圈，进到另外一个，腾出一只空手去摘李子，握在掌中，拇指温热，互相追逐。一次可以握住三个、四个或五个，

再多就不能了。这也就是为何我把这些果串称为“一把一把”的。有时会有一些果子顺着你的手腕滚落草地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

随后，当我跪在地上，捡起草地上的李子，丢进篮子，我又撞见几只黑白相间的蜗牛，它们跟着果子一起掉落地面，但没受伤。我把它们五只排成一行，然后惊讶地发现我能一眼认出曾经当我向导的那只。我也把它画了下来，尺寸比它真身略大。



哲学家巴鲁赫·斯宾诺莎 (Baruch Spinoza, 1632—1677) ——也即一般所知的贝内迪克特 (或本托)·德·斯宾诺莎 (Benedict [or Bento] de Spinoza) ——曾以磨制镜片为生。他把他的短暂一生最为璀璨的几年，用于写作《知性改进论》和《伦理学》，这两本书都是在他死后才获出版的。我们从其他人留下来的关于这位哲学家的纪念物和回忆录得知，他也画画。他喜欢素描。他随身携带一本素描本。在他突然去世之后——可能死于硅肺病，这是研磨镜片的结果——他的朋友们抢救出了他的信件、手稿、笔记，但是显然没有发现素描本。或者，如果说有的话，后来也遗失了。

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想象一本绘有他的画作的素描本重现于世。我不知道我期待的是什么。画中何物？何种画风？他是德·霍赫 (De Hooch)、维米尔 (Vermeer)、扬·斯滕 (Jan Steen)、赫拉德·道 (Gerard Dou) 的同时代人。有一阵子，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住所距离伦勃朗家只有几百米远。伦勃朗比他年长二十六岁。传记作家们猜测他们两人可能见过。在绘画者中，斯宾诺莎可能只是业余水平。就算真的找到他的素描本，我也并不指望看到一些伟大画作。我只希望从中重读他的一些言论，一些令人震

惊的哲学命题，与此同时，还能看看那些他曾亲眼观察过的事物。

后来，就在去年，一位波兰印刷工人——他是我的朋友，住在巴伐利亚——送给我一本全新的素描本，鹿皮封面，皮肤的颜色。我不禁喃喃自语：这是本托的素描本！

我开始画素描，那些主动要求进入画面的事物吸引了我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两个——本托和我——变得越来越像。我们观看——也即通过眼睛提出质疑的行为——之时，似乎变得可以互换身份。我猜，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素描实践通往何方以及指向何物有着共同的觉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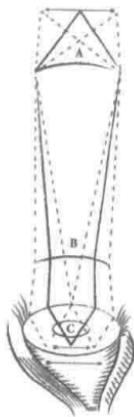


Diagram by Spinoza of telescope lenses and eye.

斯宾诺莎关于望远镜镜片和眼睛原理的图解

我正在画鸢尾花（iris），它们生长的地方，正好背靠一栋房子的南面墙壁。高度大约一米，但是因为临近盛开状态，承受着花朵的重量，稍稍有些弯曲。一茎四朵。阳光灿烂，正是五月时节，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下的积雪全部融化了。

我想，这些鸢尾花应该属于一个叫做“铜之光泽”（Copper Lustre）的品种。颜色包括暗红棕、黄、白和紫铜色：正是忘情演奏的铜管乐队乐器的颜色。花梗、花萼和萼片则是苍白的铬绿。

我用黑色墨水（犀飞利牌）、淡水彩和口水作画，用我的手指代替画笔。我坐在草地上，旁边放着几张上色的中国宣纸。我选这些宣纸，是因为它们接近谷物的色彩。也许待会我会撕下一些纸片，用作拼贴材料。我还有一个胶棒，如果需要的话。另外，草地上还有一支淡黄色的彩色蜡笔，是从一盒小学生专用的蜡笔套装中取来的，这套蜡笔的牌子叫做“乔托”。

画中的花朵，似乎快要长到实物的一半大小。画素描时，你对时间没有感觉。你是那么专注于空间的尺度。我很可能已经画了四十分钟左右，也许更久。

鸢尾花生长在巴比伦。名称却是后来才有，源于古希

腊的彩虹女神。法文的百合花 (*fleur de lys*) 也是鸢尾花的一种。花朵占据了纸张的上半部分，花茎位于下半部分，向上奋力挺进。花茎不是完全垂直，而是倒向右边的。

某个特定时刻，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放弃一张素描，以便重画一张，那么，你在打量和召唤的事物的面貌就会发生变化。

起初，你会质询模特（七枝鸢尾花），以期发现你在纸上可以记录下来的线条、造型和色调。你的素描就是答案的累积。此外，经过你对最初答案的进一步分析，当然也会累积你的修正。素描就是修正。现在我开始用中国纸了；它们把墨线转变成了叶脉。

某个特定时刻——若你幸运的话——累积变成一幅图像——也就是说，它不再是一堆符号，而是变成了某种存在。笨拙，但却在场。这是你的观看发生变化的时刻。你开始质询这个存在，一如质询模特。

它是怎样要求得到改观，变得不再那么笨拙？你盯着素描，反复扫视这七枝鸢尾花，不过这次不是观察它们的结构，而是体会它们散发出来的气息，它们的活力。它们怎么就与周遭的空气、阳光和房子墙壁反射出来的暖意彼此互动？

这时，素描用到的减法，就和加法一样重要。纸张本身也和画在纸上的形式有了相同的分量。我用刮胡刀片、铅笔、黄色蜡笔、口水。我不能急。

我不紧不慢地画，仿佛整个世界的所有时间都是我的。我也的确拥有世上所有时间。带着这个信念，我继续做着细微的修改，一处接着一处，然后又是一处，为了使这七枝鸢尾花的存在稍稍舒适一些，因而更加明显一些。世上一切时间。

其实，今晚我就得把这幅素描送走。这是为玛丽—克劳德（Marie-Claude）画的。她在两天前去世，享年五十八岁，死因是心脏病发作。

今晚，这幅素描将在某个教堂，挂在靠近她的棺木的某个地方。棺木将会打开，吊唁者们可以见她最后一面。

她的葬礼定在明天。届时，素描将会卷好，绑上丝带，和鲜花一起放进她的棺木，随她下葬。

我们这些画画的人，不仅希望创造一些可见事物呈给他人，也想捎带一些不可见的事物，陪伴着它走向不可预知的终点。

玛丽—克劳德葬礼两天之后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，告诉我说，我的一件小幅素描，一张只有《铜之光泽鸢尾花》

八分之一大小的作品，在伦敦艺术拍卖会上拍出了4500英镑价格。数目不大，但对玛丽—克劳德来说，却是她的整个一生不敢梦想能够握在手中的财富。

这次拍卖是由海伦·邦伯基金会（Helen Bamber Foundation）举办，该基金会专为那些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，以及那些生命和权利饱受移民贩子（除了名字，他们和奴隶贩子没有区别）、威慑平民的军队和种族主义政府摧残的人们提供道义上、物质上和法律上的援助。基金会呼吁艺术家捐赠作品，通过拍卖所得筹集活动资金。

我也捐了几件作品，其中包括一张副司令马科斯（Subcomandante Marcos）的炭笔小肖像，那是2007年圣诞前后，我在南墨西哥恰帕斯州（Chiapas）画的。

他、我，两名萨帕塔（Zapatista）指挥官和两个孩子，正在圣克里斯托瓦尔—德拉斯卡萨斯（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）镇郊的一栋小木屋里休息。

我们有过书信来往，马科斯和我，也曾在同一个讲台上一起发言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从未私下面对面地坐在一起。他知道我很乐意画他。我知道他不会摘下他的面具。我们本来可以谈论即将举行的墨西哥选举，或者聊聊农民这个幸存阶级，但却没有。一种奇特的寂静感染了我们。

我们相视而笑。我看着他，一点也不着急画他。似乎我们已经一起度过无数岁月，似乎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自然，根本不必多做什么。

最后，我打开了我的素描本，拿起一支炭笔。我看着他的低眉，他的双眼，他的鼻梁。其他部位都被滑雪面具和帽子遮住了。我的拇指和两只手指夹住炭笔，任其游走，仿佛通过触摸识读某种盲文点字。停下画笔。我在画上喷了定画液，免得弄脏画面。小木屋里散发着定画液的酒精气味。

在第二幅画中，他举起右手，碰到面具的脸部，巨大的手掌张开，手指之间带着痛苦。这是孤寂之痛。这是整个民族过去五百年的孤寂。

稍后，我又开始画第三幅。两只眼睛检视着我。一抹起伏不定的微笑。他正在抽烟斗。

抽烟斗或看一个同伴抽烟斗，也是消磨时间、无所事事的一种方式。

我给它喷了定画液。下一幅画，也就是第四幅，画的是两个男人睁大眼睛看着对方。两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姿态。

也许这四张画都算不上是准确的素描，只是某次邂逅的地图草稿。这些地图或许能让我们不至于迷失。这与希望有关。

我捐献给海伦·邦伯基金会的就是其中一幅地图。这幅素描的竞价过程显然漫长而又激烈。竞价者是为了支持一项他们真心相信的事业而竞相出价，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交易，稍稍接近那位隐藏在墨西哥东南山区的怀抱梦想的政治思想家。

这幅素描在拍卖会上拍得的钱款，将会用于购买机器，雇佣看护、顾问、护士、律师，帮助萨拉或哈米德或居尔森或辛……

我们这些画画的人，不仅希望创造一些可见事物以供他人观察，也想捎带一些不可见的事物，陪伴着它走向不可预知的终点。

